

• 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

抚育动机何以促进亲社会行为？基于进化适应性的 认知-能量机制及助推*

刘楠¹ 邱钰婷¹ 董志强¹ 李爱梅²

(¹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²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 亲社会行为是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 如合作、捐赠、助人等, 在促进社会繁荣、企业发展和个体幸福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 进化心理学中的“抚育动机”概念被引入管理学领域, 为理解亲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此, 本研究旨在从进化适应性视角揭示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 并认为抚育动机会分别通过“共有认知”和“希望赋能”机制促进亲社会行为。具体而言, 研究1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探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行为规律。研究2探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共有认知和希望赋能的“认知-能量”机制。研究3则基于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模式, 探讨如何在真实情景助推个体和组织亲社会行为。我们预期该研究结果有利于从进化适应性视角理解抚育动机克服亲社会行为限制力的认知-能量模型, 也为在实践中提高亲社会行为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关键词 抚育动机, 亲社会行为, 进化适应性, “认知-能量”机制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亲社会行为是指有利于他人、群体或社会的行为(张玮玮等, 2023; Eisenberg & Mussen, 1989; Labroo & Goldsmith, 2021), 包括合作、捐赠、助人、分享等行为(Liang et al., 2016; Roux et al., 2015)。回顾漫长的人类进化历程, 人类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对种族存续具有重要意义, 分享、合作、助人等行为使得人类在面对粮食短缺、自然灾害等族群危机时共渡难关。当今社会, 促进亲社会行为仍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层面, 亲社会行为有利于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 促进共同富裕(杨方方, 2022); 在企业层面, 亲社会行为有利于提高企业声誉(Eberle et al., 2013)、提高员工

创造性和生产力(Liao, et al., 2022); 在个体层面, 亲社会行为有利于个体人际声誉(Gross & De Dreu, 2019)、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Falk & Graeber, 2020; Wang et al., 2020)。尽管亲社会行为对社会、企业和个体具有重要意义, 但研究表明人们并不总是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 存在行为限制力(如自我-他人获益权衡, White et al., 2020)。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也成为行为决策、管理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重点关注的问题, 其研究成果在全球顶级期刊上持续保持着热度。以往研究从个体因素、社会因素、情景因素等多种角度探讨了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孙庆洲等, 2023; Brough et al., 2016; Wu et al., 2022), 但仍有部分现实情景中的亲社会行为未能在以往研究中得到解释。例如, 扎克伯格为何会在大女儿出生后捐出 99% 的股份用于公益项目? 新手父母为何会愿意花费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经验帮助后续的新手父母? 亟需有研究从新的研究视角为这些现象提供解释。

近年来, 研究者们开始将源自于进化心理学的人类深层次动机机制——“抚育动机”引入到管

收稿日期: 2025-04-0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401102; 72571114);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5YSG13);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40523); 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23SK09)。

通信作者: 李爱梅, E-mail: tliaim@jnu.edu.cn

理学研究中(Li et al., 2019)。抚育动机(parenting motivation)是指一系列旨在照顾脆弱的年幼儿的心理动机机制(Buckels et al., 2015; 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 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确保后代存活的重要一环。不管是个体决策者还是企业决策者, 回归到人类社会不计其数的小家庭中, 可能都具有同样的身份——为人父母。有父母身份的个体在总决策人群中占据着非常重的比率(Liang et al., 2023), 父母角色的启动或者父母思维都可能会启动抚育动机; 此外, 即使是非父母的个体也会被情境因素如广告宣传或标语启动抚育动机(Li et al., 2019), 进而影响后续的决策。如研究发现, 是否为父母影响着企业高管的决策、启动抚育动机影响个体的消费决策(Cronqvist & Yu, 2017; Liang et al., 2023)。在现实中, 许多亲社会行为的实施者是身为父母的个体(Cakanlar et al., 2023; Mesurado & Richaud, 2017), 如以家庭的名义捐款、将家中不用的衣物捐赠给他人。F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格在其大女儿出生后宣布捐赠出自己 99% 的股份用于慈善事业也给我们启示: 父母身份的激活或抚育动机的启动显著增强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综合思考, 我们认为探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现象、机制以及助推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但纵观现有的文献, 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作为人类进化的产物, 抚育动机是一种底层的调节系统以调节人类以有利于后代生存和基因繁衍的方式行为, 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可以用进化适应性(evolutionary adaptation)来解释: 为了保证基因延续, 人类需要不断地适应环境并克服环境挑战(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当环境中存在与人类基因延续相关的机遇或障碍时, 进化适应性会被激活并促进机遇获取(如: 获取更好生存条件)或障碍规避(如: 规避危险)等适应性行为(Lewis et al., 2017)。现有研究揭示了抚育动机导致的一系列回避导向的行为变化: 抚育动机启动会让个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风险规避、谨慎而小心(Schaller, 2018), 这样的行为改变有利于保护后代免受潜在危险, 具有进化学意义。但为了保证后代的适应性, 父母并不仅仅需要保证后代的存活(survive), 同时也要让后代茁壮成长(thrive; Schaller, 2018)。抚育动机应当也会导致个体采取与后代存活相关的机遇获取行为, 但现有研究还

较为匮乏。

基于进化适应性视角, 本研究认为: 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潜在的机遇获取方式, 抚育动机的启动可能会促进亲社会行为, 并进一步提出抚育动机会分别通过“认知-能量”路径驱动亲社会行为。认知-能量理论(cognitive energetic theory)认为行为可能性取决于“行为驱动力(driving force)”和“行为限制力(restraining forces)”的相对大小。其中, 行为驱动力像物理学力一样存在方向和大小: “方向”代表着是否有想要从事该行为的认知(想做); 而“大小”则指是否有足够从事该行为的能量(能做), 认知和能量驱动力决定了个体从事相应行为的可能性(Kruglanski et al., 2012)。一方面, 抚育动机可能会改变个体对亲社会行为受益人关系的认知: 更倾向于将与亲社会行为受益人的关系知觉为共有关系, 进而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另一方面, 适应性的抚育动机也可能为亲社会行为提供行为能量: 增强具有进化适应性的能量情绪——希望, 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综上, 本研究旨在探讨以下关键科学问题: (1)抚育动机是否会影响亲社会行为? (2)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是什么? (3)若抚育动机可以促进亲社会行为, 如何利用抚育动机助推亲社会行为?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不仅创新性地从理论上探讨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行为规律及内在机制, 同时也为在真实情景中助推个体和组织抚育动机以及亲社会行为提供实践指导。

2 研究综述与及评述

2.1 进化适应性视角下的抚育动机

抚育动机(parenting motivation), 或抚育动机系统(parental care motivational system), 是指一系列旨在照顾脆弱的年幼儿的心理动机机制(Buckels et al., 2015; 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 Li et al., 2019), 是一种源自进化角度的人类动机, 是篆刻在人类基因之中的本能。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可追溯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Darwin, 1859), 其核心论点是适应性(adaptation)。人类的生存发展是一系列适应并生存的过程, 为了留下后代, 所有的生物都必须解决生存、生长、发育和繁衍等适应性问题(Chisholm et al., 1993)。适应性问题(adaptive problem)是指人类进化历程中长期持续出现的一系列生存和基因延续相关的机遇

(例如:潜在配偶、富饶的栖息地)或障碍(例如:凶猛的野兽、食物短缺;Cosmides & Tooby, 2000)。与之相对应,适应性则是对这些机遇的利用以及障碍的规避。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其适应环境的行为机制,如自我保护系统以躲避外界灾难、繁衍适应性系统确保基因繁衍等(Kenrick et al., 2010; Neuberg et al., 2010)。而进化心理学的核心在于:即使当代人类所处的环境与人类祖先已经大相径庭,现代人类仍然天生具有特定的心理机制,倾向于采用有助于我们祖先生存、繁衍和繁荣的方式来处理信息和做决策(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

根据生命史理论(life-history theory),要达到生物的繁衍适应性不仅仅要保证自己的存活和繁育,也需要确保后代可以存活至可繁育年龄(Buckels et al., 2015; Chisholm et al., 1993)。与大多数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后代成熟缓慢,且在婴儿期相对脆弱,无法依靠自己独自生存。在成熟至可繁育年龄之前的数年间都容易受伤和生病(Schaller, 2018)。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照顾后代并保证其存活而发展出的抚育动机,便成了人类完成繁衍性适应的重要一环(Geary, 2000)。抚育动机源自于 McDougall (1908)首次提出的抚育直觉(parental instinct)概念,并认为抚育直觉是影响人类行为最强大的直觉(the most powerful instinct),但早期研究大多关注于为人父母的群体(Bornstein, 2002),之后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抚育动机并不仅仅局限于父母。虽然当一个人成为父母后,抚育动机会频繁地被激活,身为父母(vs. 非父母)的个体可能具有更高的抚育动机(Buckels et al., 2015)。但所有成年人都具备抚育后代的进化基础(Buckels et al., 2015; Gilead & Liberman, 2014),一些环境因素也可以启动个体(包括父母和非父母)的抚育动机,如 Lorenz (1943)婴儿图式(Kindchenschema, baby schema)中具备婴儿特点的线索可以启动个体的抚育动机(Schaller, 2018)。此外,抚育动机也存在个体特质差异,人们可能天生拥有较高或较低的抚育动机,可采用抚育动机量表对其进行测量(Buckels et al., 2015)。

作为一种从属于进化心理学框架下的概念,抚育动机是一种底层的调节系统,用以调节人类以有利于后代生存和基因繁衍的方式行为(Schaller et al., 2017; Tooby & Cosmides, 2015)。研

究表明抚育动机会导致一系列的行为变化。首先,抚育动机让个体变得更注重规避风险、谨慎而小心。如研究发现身为父母的个体对危险更加敏感,在视觉实验中将潜在危险人物的图片(如罪犯)知觉为更大(Fessler et al., 2014)。父母角色凸显时,被试的风险感知敏感性更高、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风险规避以及对陌生人的不信任(Eibach & Mock, 2011)。研究也表明抚育动机让个体的行为更加谨慎(Sherman et al., 2009)、偏好规避含有风险的选项(Li & Liu, 2018)。抚育动机还会显著影响个体的道德感知以及政治判断。高抚育动机特质个体对违反社会规则人群的道德评估更加严肃(Buckels et al., 2015)、对道德上的错误更加敏感(Kerry & Murray, 2018)、对有冒犯性的行为表现出更强烈的不赞同或反对(Eibach et al., 2009);启动抚育动机时,个体对那些可能带来危险的外群体会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和偏见,无论这些外群体是否真的有威胁(Gilead & Liberman, 2014)。高抚育动机的个体还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道德保守以及经济保守行为,如支持传统道德标准及现行经济政策(Kerry & Murray, 2018, 2020)。在社会认知层面,抚育动机改变个体对社会线索的关注与解释方式。Buckels 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高抚育动机特质的个体对婴儿的面孔有更积极的反应、对娃娃脸的成年人有更赞许的态度。当启动抚育动机时,个体感知与他人的联系更加密切,更采用相依型而不是独立型自我建构(Li & Gong, 2018)。此外,抚育动机也会启动了个体对后代的资源投入。父母会主动牺牲自我资源并投入到子女身上(王晓田, 2007; Canova et al., 2005)。抚育动机会影响个体的储蓄动机:成为父母后个体会更愿意存钱,并制定一系列按需求层次排序的存钱目标(如应对与孩子相关的突发家庭开销; Canova et al., 2005);教育水平越高的父母更会为孩子的大学存钱(Lee et al., 1997)。此外,抚育动机还会启动家庭中资源获取者的主动资源获取,进而表现得更具长期导向(Li et al., 2019)。

2.2 亲社会行为与动机机制

(1)亲社会行为与动机机制

亲社会行为是指有利于他人、群体或社会的行为(郑晓莹 等, 2015; Eisenberg & Mussen, 1989; Labroo & Goldsmith, 2021),比如帮助他人、分享宝贵资源、慈善捐赠、做志愿者、遵守社会规则

等(Böhm et al., 2018; Liang et al., 2016; Roux et al., 2015)。虽然亲社会行为对他人(或群体)有明显的好处,但人们并不总是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然而亲社会行为具有提高社会公平与平等、增加信任与合作(De Dreu et al., 2022; Goenka & Van Osselaer, 2019)等重要社会影响,学术界对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个体因素包括宗教信仰、性别、权利感、道德感(姚琦等, 2020; Brough et al., 2016; Reed II et al., 2016; Stavrova & Siegers, 2014), 社会因素包括社会阶级、社会排斥、社会比较(孙庆洲等, 2023; 张玮玮等, 2023; Lee & Shrum, 2012), 到情景因素如情绪、框架效应、奖励与惩罚等(孙倩等, 2023; Basu, 2021; Cavanaugh et al., 2015; Wu et al., 2022)。

从进化适应性视角来看,亲社会行为导致个体自身资源损耗,因此会降低个体适应性(谢晓非等, 2017)。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利于生物生存和繁衍的特征传递给后代的几率更高,而不利生存和繁衍的特征将较少被传递甚至消失(Darwin, 1859)。那么人们为何会从事亲社会行为?一方面,亲社会行为可能是出于利他动机,即个体从事亲社会行为可能是单纯出于对他人的关心,期望他人而非自己获益(Batson, 2011)。人类天然地有一种关心和关爱处于困境中的他人的趋势(Grant, 2008)。例如,研究中让被试采用他人视角(perspective-taking)可以增加对他人所处情景的理解,做出更多亲社会行为(Batson & Moran, 1999; Shih et al., 2009)。此外,利他的亲社会动机也与心理暖流效应(warm glow)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捐助慈善组织是因为帮助他人会让个体体验到积极情绪,或者是出于单纯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人的动机(Imas, 2014; O'Brien & Kassirer, 2019; Supphellen & Nelson, 2001)。另一方面,个体可能出于自利动机从事亲社会行为。自利动机驱动的亲社会行为,源于个体期望获得奖励或其他收益。这种收益既可以是直接的,如“我帮你,你也会帮我”式的互惠,或者是“我帮助你,同时我也能获得一些利益”式的自利回报。如研究表明有金钱奖励或者精神奖励时,个体表现出更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更多为公共物品投入和捐赠(Wu et al., 2022; Johnson & Grimm, 2010)。这种收益也可以是间接的:个体并不期望受益者直接归还利益,但会因亲社会行为而从其他方面获益。如个体从

事亲社会行为是希望从他人那里获得更积极的评价从而建立良好的声誉(Berman & Silver, 2022; Bigman & Tamir, 2016);个体捐赠金钱并不是单纯地想帮助受益者,而是希望在社会竞争中凸显自己,提高自己的社会福利(Roux et al., 2015)。此外,还有研究发现个体做更多亲社会行为可能是由于想增加与他人的互动并扩大社会联系(Hamilton et al., 2021),也即,亲社会行为本身可视为一种潜在的资源获取行为,从事亲社会行为可能会给个体带来互助、奖励和声誉等资源。

(2)亲社会行为的进化基础

从进化适应性视角来看,以下几个理论可以为亲社会行为适应性提供解释:

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 theory)——亲缘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偏好于与自己基因关系近而不是远的人,进而有利于自己的基因(Nowak, 2006)。如人类父母对于其子女不计成本的投入和付出虽然损耗了自我资源,但却保证了后代的存活和繁衍,实际上有利于自身的基因繁衍(Kurzban et al., 2015)。而这种无条件的利他又可以迁移到非父母-子女情景中,进而在特定情景中表现出对他人的单纯利他。如看到他人处于困境时,人类会感到难过进而表现出利他行为(Preston, 2013)。该理论主要面临的问题是通常只能解释近亲之间的亲社会行为,也无法确定这种亲社会行为会在何时转移到非近亲情景中。

互惠利他理论(reciprocal altruism theory)——互惠利他可以解释在没有亲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利他行为。互惠利他的最初定义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直接互惠。该理论认为,虽然利他者做出利他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如果日后受益人给利他者某种回馈,那么利他者因帮助他人所导致的适应性降低就可以通过接受受助者的回馈得到补偿(Trivers, 1971)。这种“我帮你一次,你也帮我一次”或者是“我帮助你,我也可以获得一些利益”的直接互惠保证了群体间的合作。原始社会中人类面临着严峻的自然环境,个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帮助人们克服进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Nowak, 2006),具有进化学意义。但该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利他行为无法得到回馈的情况,比如对于一些陌生人的帮助可能无法实现直接回馈,存在解释局限性。

高成本信号理论(costly signaling theory)——

高成本信号理论认为亲社会行为可靠地传递出关于个人品质的信号(谢晓非等, 2017; Zahavi, 1975)。如个体帮助他人并不期望对方直接回报, 而是期望获得他人积极的评价, 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或显示自己的合作性特质(Berman & Silver, 2022; Bigman & Tamir, 2016); 男性做出亲社会行为是为了向异性展示自己具有好的品质, 增加自己获得伴侣的可能性(Borau et al., 2021)。而获得社会声誉和表现出自己的合作特质可以获得更多合作机会、更有可能被选为合作领导(Hardy & van Vugt, 2006), 增加个体的进化适应性。该理论也存在着限制条件: 只能解释公开展示、可被观察的亲社会行为。

2.3 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

认知-能量理论(cognitive energetics theory)通常用于解释个体在面临需要付出努力(efforts)或是存在障碍(obstacles)情景下的行为动因。该理论描绘了行为驱动力(driving force)以及行为限制力(restraining force)之间的动态过程: 当驱动力大于限制力时行为可能性高, 当驱动力小于限制力时行为可能性低。想要从事特定行为, 其行为驱动力至少要在大小上高于行为限制力(Hockey, 1996; Kruglanski et al., 2012)。在该理论中, 行为驱动力被界定为一种“能量驱动的认知”(the motivated cognition), 具有“方向”与“大小”两个维度: 其中“方向”代表着人们是否具备想要从事某行为的认知, 如对行为目标的认同或期望; 而“大小”则指个体是否具备执行该行为所需的行为能量(Dunning, 1999)。认知与能量的任一维度增加, 均可提升行为驱动力的整体水平, 从而提高行为的可能性(Yan & Murray, 202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尽管认知与能量在理论上可共同作用于行为驱动力, 但相关研究亦表明二者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路径分别增强行为倾向。例如, 在行为限制增强(如行为难度提升)时, 无论是认知的增强还是能量的提升, 均可提高行为的执行可能性(Kruglanski et al., 2012)。

鉴于其良好的行为解释力, 认知-能量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研究中, 如运用于解释个体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工作表现(DeWall et al., 2010)、解释个体的亲环境行为(Yan & Murray, 2023)、用以提升领导工作表现与参与度(Lanaj et al., 2019)等。亲社会行为存在行为限制力: 首先, 亲社会

行为需要自己付出(cost)并让他人受益(Small & Cryder, 2016)。而理性人假说认为人们会倾向于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Penner et al., 2005), 亲社会行为因此存在自我-他人权衡的行为限制力。其次, 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的结果相比于其他行为来说更加模糊、不确定, 人们在多数情况下不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能够发挥作用, 缺少亲社会行为能量(White et al., 2020)。那么认知-能量理论是否可以运用于解释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现有研究尚未对此进行探讨。本研究旨在从进化适应性视角, 探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 并分别考察其通过促进“认知”和“能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具体路径。

(1)抚育动机影响行为认知。以往研究揭示了抚育动机对个体认知的影响, 如抚育动机启动改变了个体对风险的认知, 将潜在危险知觉为更大(Fessler et al., 2014); 抚育动机影响个体的社会认知: 抚育动机导致个体对婴儿的面孔有更积极的反应、对娃娃脸的成年人有更赞许的态度(Buckels et al., 2015)等。研究还对抚育动机如何影响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认知进行了初步探讨, 如发现抚育动机使得个体感知与他人联系更加密切(Li & Gong, 2018)。而人们从事亲社会行为的主要行为限制力是“保存自我利益”与“让他人获益”之间的权衡(Small & Cryder, 2016), 因此改变对亲社会受益者的关系认知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如研究表明个体对亲社会行为受益人是否为自己内群体成员的关系认知影响个体捐款可能性(Duclos & Barasch, 2014); 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知觉为共有关系(vs. 交换关系)时, 个体会更愿意帮助他人(Guo et al., 2022)。抚育动机是否会影响个体对亲社会行为受益人的关系认知进而影响亲社会行为? 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直接探讨。

(2)抚育动机影响行为能量。对进化适应性问题的应对中包含着行为能量的调配。当检测到环境中的适应性问题时, 进化适应性情绪会作为“前端反应”被激活(Cosmides & Tooby, 2000)。进化视角下的情绪不仅仅是简单的情绪或情感, 而是由特定适应性问题引发的能量调配系统以及行为激活剂, 并以处理特定适应性问题的方式引导能量分配为适应性行为提供能量(Cosmides & Tooby, 2000; Keltner et al., 2006)。如暂时抑制其

他需求将能量集中在适应性问题解决上, 进而促进一系列有利于解决适应性问题的认知和行为 (Griskevicius et al., 2009)。如在经典的适应性应激行为“战或逃”(Fight-or-flight response)中: “战”相关适应性问题引发前端情绪愤怒(anger), 关闭自我保护系统, 为“战”提供趋近型行为能量(Carver & Harmon-Jones, 2009); 而“逃”相关的适应性问题引发前端情绪恐惧(fear), 此时饥饿及求偶等需求均不重要, 为“逃”提供回避型行为能量(Cosmides & Tooby, 2000; Griskevicius et al., 2009)。若亲社会行为是有利于后代生存的适应性机遇, 那么当抚育动机识别该适应性问题时, 又会导致怎样的适应性情绪为后续行为赋能? 本研究将对此进行探讨。

2.4 研究现状评述

虽然现有研究对抚育动机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于抚育动机导致的回避导向的行为变化, 如发现个体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风险规避、谨慎而小心等(Schaller, 2018; Sherman et al., 2009)。但人类不仅仅要适应环境中的威胁, 也需要为自生存活以及后代繁衍争取到更好的机会(Lewis et al., 2017)。为了保证后代的繁衍性适应, 父母并不仅仅只是需要后代存活, 也需要促进后代茁壮成长(Schaller, 2018)。研究也发现抚育动机与广泛性的趋近动机正相关(Buckels et al., 2015)。因此, 抚育动机可能会导致个体机遇获取行为, 以期为后代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 但现有相关研究还较少, 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抚育动机导致的金钱资源获取行为(Canova et al., 2005), 抚育动机也可能会促进个体其他类别资源的获取(如社会资源)。其次, 抚育动机在管理学研究中的探讨仍处于起步阶段, 仅有数篇研究探讨了抚育动机对消费者跨期偏好以及多样性偏好的影响(Li et al., 2019; Liang et al., 2023)。但鉴于庞大的父母群体以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抚育动机启动线索, 抚育动机可能会对管理决策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如影响管理情景中的亲社会行为。

关于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 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从前因变量角度来看: 虽然现有研究从个体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情景因素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 但尚未有研究探讨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从亲社会

行为的解释机制角度来看: 现有研究认为自利动机和利他动机角是解释亲社会行为的主要动机机制, 但这两类机制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亲社会行为, 亟需有研究从新的理论视角探讨亲社会行为的驱动力。最后, 从亲社会行为进化机制角度来看: 虽然现有研究从进化视角探讨了亲社会行为的驱动机制, 但现有对亲社会行为的进化解释机制仍存在不同的理论争议, 这些理论本身也被认为存在其局限性。

此外, 认知-能量理论虽然已经被运用于解释有行为限制力的行为, 如目标寻求和工作表现(Lanaj et al., 2019), 但尚未有研究从认知能量驱动力的视角探讨亲社会行为。该研究领域存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理论空白。我们认为, 进化适应性下的抚育动机一方面可能会改变个体与亲社会受益人的关系认知, 另一方面可能会激活近端能量情绪调配能量, 为后续适应性行为赋能。针对以上不足, 本研究旨在对进化适应性视角下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现象及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3 研究构想

围绕抚育动机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这一核心问题, 本研究将分为 3 个研究逐步推进。其中研究 1 探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的行为规律; 研究 2 探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 实现本研究的核心理论创新; 研究 3 探讨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现场助推研究, 将揭示出来的理论成果与管理实践结合, 创造性地设计助推方法。3 项研究共预期开展 8 个实验, 具体而言: (1)研究 1 旨在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 1a: 大数据法、研究 1b: 多时点调查、研究 1c: 实验室法)验证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由于抚育动机不但可以通过凸显父母角色启动, 也会被情景因素所启动, 此外个体也存在抚育动机特质个体差异, 因此, 在研究 1 的 3 个子研究中分别通过父母角色凸显(研究 1a)、抚育特质测量(研究 1b)以及抚育情景启动(研究 1c)测定抚育动机, 验证不同来源的抚育动机是否会一致地影响亲社会行为。此外, 由于亲社会行为也包含了多样的行为, 如为慈善组织捐款、帮助他人、分享资源等, 因此子研究中也采用了不同的亲社会行为测定方法验证本研究效应的稳健性。(2)研究 2 拟开展 4 个

子研究。研究 2.1 拟通过两个子研究验证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共有认知机制。其中,研究 2.1a 通过中介测量验证共有认知的中介效应,研究 2.1b 则采用以调节验证中介的方式再次验证共有认知机制,并提出受益人社会距离的调节效应(外源因素);研究 2.2 则通过两个子研究验证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希望赋能机制。同样地,研究 2.2a 通过中介测量验证中介,研究 2.2b 以调节验证中介,并提出道德认同感的调节作用(内源因素)。(3)研究 3 旨在通过现场实验,如与企业、慈善基金会合作(如腾讯公益平台),通过在慈善宣传中加入父母角色凸显或婴儿图式等抚育动机启动线索,探讨利用抚育动机助推亲社会行为的有效方式。

3.1 研究 1: 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行为规律

抚育动机调节个体的行为以适应后代生存和基因繁衍(Schaller et al., 2017)。当环境中存在着与后代存活或基因延续相关的适应性机遇或障碍时,抚育动机会促进个体对这些机遇的利用以及障碍的规避,以保障后代更好的存活(Schaller, 2018)。如研究抚育动机促进对潜在风险或威胁的适应性:抚育动机使得个体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更谨慎及保守(Eibach & Mock, 2011; Fessler et al., 2014; Kerry & Murray, 2020)。此外,抚育动机促使人们获取有利于后代存活的机遇:抚育动机促使个体设定一系列的存钱目标(Canova et al., 2005)、促使个体主动获取资源(Li et al., 2019)等。除了物质资源之外,抚育动机的启动可能使得个体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寻求社会资源,以期更好地养育后代。如研究发现初为父母的人会更倾向于从在线社区中寻求有相同经历的人并与之建立联系(Labroo & Goldsmith, 2021);抚育动机的启动也会使得个体采用相依型自我构建而不是独立型自我构建,这可能是由于相依型自我建构更有可能保证与群体中的他人和谐相处,是抚育角色中必不可少的因素(Li & Gong, 2018)。

亲社会行为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历程中得以留存,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进化适应性,可视为一种潜在的资源获取途径。早在自然环境严峻的原始时代,相互支持和亲社会行为保障了人类种群及后代的存活(Nowak, 2006)。亲社会行为虽然需要个体付出,但也会使得个体获得帮助、奖励、声誉等社会资源。比如在互惠利他中,亲社会行为

可以为个体带来他人的帮助或奖励(Wu et al., 2022)。亲社会行为也有利于个体建立自己的声誉或显示自己的特质(Berman & Silver, 2022; Bigman & Tamir, 2016),获取更多合作机会和资源(Hardy & van Vugt, 2006)。此外,亲社会行为有利于个体建立和扩大社会联系(Hamilton et al., 2021)。当个体处于期望建立社会联系的阶段时,会通过主动实施亲社会行为来制造机会(Stenstrom et al., 2018)。而亲社会行为带来的上述资源无疑为基因延续和后代存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若抚育动机适应性强化个体对机遇的获取,可能会导致其更多从事亲社会行为,基于以上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1: 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

3.2 研究 2: 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

(1)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机制:共有认知

人际关系理论(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ory)认为,人与他人会建立两种类型的关系:交换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和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 Clark & Mills, 1993)。交换关系中,个体假设自己付出利益是会获得回报的,该关系中的利益接受者也会产生一种归还相当利益的义务(Clark & Mills, 1979; Clark & Mills, 2012);而在共有关系中,个体为对方付出只是为了提升对方的福利,并且无论是付出者还是受益者都不会觉得这样的付出有隐形或显性的价格标签。但是付出者可能希望当自己出现同样的需求时,接受者能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自己的需求(Clark & Mills, 2012)。

其中,共有关系是具有进化意义的关系认知。相比于其他物种,人类的后代成熟缓慢且在婴儿期相对脆弱(Schaller, 2018)。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照顾,人类的新生儿将无法生存(Kurzban et al., 2015)。在早期的原始时代,部落内有亲缘关系的人们建立共有关系相互支持,为新生儿提供不间断的照顾(Clark & Mills, 2012)。此外,在远古时期的小型狩猎采集社会,人们无法预测谁会找到食物、住所以及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也无法预测谁有一天会非常需要它们,这就决定了利益和资源的共同分享(communal sharing)。这种在部落中的非亲缘共有分享保证了人类的存活和发展,在

人类进化历程中需要先学会共有关系(vs. 交换关系)才能确保生存(Kelley et al., 2003)。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社会中人们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考虑采用共有关系认知。

抚育动机的启动可能使得个体更多采用使我们的祖先能够生存、繁荣的共有关系认知来看待他人,尤其是当个体意图建立社会联系时,更有可能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知觉为共有关系。研究表明,共有关系的一个核心功能是建立联盟(affiliative),从而促进关系联结的形成(Cannon & Rucker, 2020)。如刚迁入新社区的居民更倾向于采用共有关系而非交换关系模式,以期建立邻里社交联结(Clark & Mills, 2012)。同时,研究也表明共有关系的认知会使得个体更愿意牺牲自我利益做出亲社会行为(Guo et al., 2022),如高共有关系导向个体更愿意与朋友公平地分配奖励(Thompson & DeHarpport, 1998)、更愿意帮助无家可归的人(Bryan et al., 200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2: 抚育动机导致了更强的共有认知,进而促进个体亲社会行为。

若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认知机制是由于抚育动机导致了更强的共有关系认知,以期获取社会联系和资源,那么该效应在无法建立共有关系的群体中可能会减弱。社会距离可能是影响共有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根据共有关系的定义:在共有关系中个体付出并不期望对方回报,但是期望当自己出现同样的需求时对方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自己的需求(Clark & Mills, 2012)。虽然当今社会相比于原始社会,人们会在更大的社会范围以及社会关系中考虑付出与收益,并采用共有关系(Pataki et al., 1994),但在超出一定社会范围之后可能无法建立这样的关系。如在较远的社会距离(国外和全球)人群中,个体无法期望当自己出现同样的需求时,接受者能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自己。因此,受益者的社会距离可能调节了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上述效应可能只会在近社会距离中存在,而在远社会距离中减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3: 与受益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远 vs. 近)调节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机制。具体而言,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效应只在近社会距离中显著,在远社会距离中减弱。

(2)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能量机制: 希望赋能

进化适应性中还包含着行为能量的调配。如当环境中存在与人类生存或基因延续相关的机遇或障碍时,需要暂时抑制其他需求将能量集中在适应性问题解决上,进而为后续有利于解决适应性问题认知和行为提供能量(Griskevicius et al., 2009)。通常而言,当环境中存在适应性问题时,进化适应性情绪会作为“前端反应”被激活(Cosmides & Tooby, 2000),并以处理特定适应性问题的方式引导能量分配为适应性行为提供能量(Cosmides & Tooby, 2000; Keltner et al., 2006)。如战或逃应激反应中唤醒“愤怒”为“战”赋能、唤醒“恐惧”为“逃”赋能(Carver & Harmon-Jones, 2009; Cosmides & Tooby, 2000)。

亲社会行为作为促进后代存活的适应性机制,当抚育动机系统识别到此类适应性需求时,可激发“希望”这一适应性情绪反应。希望情绪通常用于描述一个人的“对更好情景的渴望并相信所期望的改善是有可能的”(Lazarus, 2006)。作为一种认知评估情绪,希望源自于两个必要的条件:(1)评估目前的情景不尽如人意并期望改善;(2)同时相信改善或者期望的结果是有可能实现的(Cohen-Chen et al., 2015; Lazarus, 1999)。Snyder (2002)进一步将希望定义为一种积极的能量激励状态,它基于(a)感知成功的能动性:目标导向的能量,和(b)途径:目标的计划实现。因此,希望不但包含了环境应对的行为能量,还包含了对于实现目标的能动性。研究也发现希望情绪的动机资源作用(motivational properties)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行为能量(Bury et al., 2020; Nelissen, 2017)。研究表明,希望作为一种进化适应性情绪,在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Bunston et al., 1995)。在人类进化历程中许多危急生存条件下,人们需要对自己所处的困境设想出最有利的可能性,以免失去希望。这样能有效预防绝望情绪的产生,并增强个体适应环境的主观能动性(Lazarus, 1999)。放弃希望会导致死亡,而保持希望会激发行为能量并克服困难,保证人类的存活及物种的延续(Korner, 1970)。个体生命存在具有必然的有限性,而基因的存活却是长期的(Cosmides & Tooby, 2000),抚育动机解决后代存活和基因延续的适应性问题,为基因长期延续

带来可能性。当环境中存在适应性问题时(期望改善),基因延续带来的可能性可能会导致个体更高的希望适应性情绪,为后续适应性行为赋能。以往研究也证实了希望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效应(Cavanaugh et al., 2015)。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4:抚育动机增强了个体的希望感知,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

若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能量机制是由于促进了希望赋能情绪,那么这一效应可能会在较难导致希望的情景下削弱。根据希望的定义:希望是一种认知评估情绪,其产生的两个必要的条件是:(1)评估目前的情景不尽如人意并期望改善;(2)同时相信改善或者期望的结果是有可能实现的(Cohen-Chen et al., 2015; Lazarus, 1999)。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情景中,个体感知到环境中存在适应性问题(亲社会行为获取)以及基因延续带来的可能性可能是导致希望的内在原因。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亲社会行为情景中评估认定目前的情景不尽如人意并期望改善。如在需要从事亲社会行为的情景中(e.g.,看到无家可归的人),不认为该情景不尽如人意并期望改善(e.g.,改善他们的境遇),进而影响希望路径的产生。

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是指由一系列道德特质组织而成的自我图式,当人们被问及道德意味着什么时,通常会想到这些特征,比如公平、诚实、善良等(Aquino & Reed II, 2002)。道德系统决定了个体对是非的判断,以及对“什么对个人和社会有利/有害”的原则和价值观(Reed II et al., 2016)。相比于低特质道德认同的个体来说,具有高特质道德认同的个体更易感知到符合道德的重要性,并要求自己按照符合道德的方式行为(Reed et al., 2007),如在亲社会情境中更易觉察到需要改善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并认为实施亲社会行为具有必要性。而低特质道德认同的个体则更可能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不敏感,进而阻碍希望情绪的产生。因此,抚育动机导致的希望赋能效应可能会在高道德认同的人群中被强化,而在低道德认同的人群中削弱。

命题5:道德认同(高 vs.低)调节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能量机制。具体而言,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效应在高道德认同的个体中

增强,而在低道德认同的个体中减弱。

3.3 研究3: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现场助推研究

助推是近20年行为科学与行为决策领域的一种新研究取向,是指运用既不必取道行政命令也不借助经济杠杆的第三条“柔性”的方法,通过适当改变人们面对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使得人们的行为发生预期变化的干预方法。助推方法不仅成本低、效率高、效益大,而且不限制个体的选择自由,规避了家长制和自由主义的弊端,是行为科学家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的新思路和新方案(何贵兵等, 2018; 李纾, 2016)。行为助推的开拓者和倡导者Thaler教授被授予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助推的方法也已经在健康、环保、社会保障、教育、公益慈善等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利用框架效应增加时间线索助推人们的退休储蓄以及财政决策(Beshears et al., 2021);利用默认选项设置助推减少外卖一次性餐具的使用(He et al., 2023);利用不同时间和效价信息宣传助推疫苗接种(刘楠等, 2022);利用健康目标助推个体健康决策(耿晓伟等, 2018)等。

通过研究1和研究2的探索,本研究建立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地,是否可以利用抚育动机助推亲社会行为?基于先前的研究基础,研究3拟综合利用研究1和研究2中的抚育动机启动方式在真实的情景中进行现场干预,探索助推人们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有效方法,为个体和组织促进亲社会决策提供参考。在宣传标语中额外加入一条信息提示是助推常用的方法(Thaler & Sunstein, 2021)。因此,研究3通过在真实的亲社会行为情景中(例如:慈善捐赠标语)加入父母角色启动以及婴儿图式启动线索,探讨其助推有效性。这样的现场助推研究一方面可以利用现实情景再次验证本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增强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另一方面也能够最为切实地将本研究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实现可观测的社会行为助推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6:增加抚育动机线索可以在真实情景中助推亲社会行为。

4 理论建构与研究意义

作为最重要的人类行为之一,亲社会行为是长盛不衰的研究经典和前沿热点,受到了众多学

科研究者的关注(谢晓非等, 2017)。以往研究也从多个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如何促进亲社会行为(孙庆洲等, 2023; Brough et al., 2016; Cavanaugh et al., 2015; Stavrova & Siegers, 2014; Wu et al., 2022)。本研究从进化适应性视角, 创新性地构建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模型, 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首先, 本研究从进化适应性视角建立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行为规律。抚育动机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基础性调节机制, 驱使个体采取有利于后代存活与基因延续的行为(Buckels et al., 2015; 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 例如主动获取与基因延续相关的资源、规避潜在风险等(Schaller, 2018)。虽然现有研究对抚育动机如何影响人类行为进行了探讨, 但主要聚焦于其引发的风险规避倾向(Eibach & Mock, 2011; Fessler et al., 2014), 对其如何促进趋近行为获取尚缺乏系统研究。然而, 从后代发展的整体需求来看, 仅保障其存活并不足以实现基因的有效延续, 更需要推动其全面成长与社会适应。在早期的原始时代, 群体内部的资源共享与相互照料是后代存活的关键(Clark & Mills, 2012)。在当代社会, 抚育动机的激活可能促使个体在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中建立联系、获取社会资本, 以适应抚育环境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已有研究表明, 亲社会行为是促进社会联结与资源获取的重要策略, 能够帮助个体赢得支持与照料、提升社会地

位(Berman & Silver, 2022; Bigman & Tamir, 2016; Stenstrom et al., 2018)。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 抚育动机不仅促使个体规避威胁, 也可能驱动其积极地从事亲社会行为, 以获取有利于后代发展的社会资源与支持。此外, 在探讨行为机制的基础上, 还需进一步考虑生理因素在抚育动机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中的潜在作用。例如, 已有研究发现, 父母与子女的互动会显著提升个体体内的催产素水平(Feldman & Bakermans-Kranenburg, 2017), 而催产素已被证实是促发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Christ et al., 2016)。然而, 本研究旨在验证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普遍影响机制, 即探讨这一行为规律是否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 而不仅限于已为人父母的个体。因此,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有必要控制和排除生理机制的干扰。具体而言, 可以通过对比存在生理机制影响与无生理机制影响的实验组, 进一步剥离催产素等生理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从而更准确地验证抚育动机在行为层面对亲社会行为的独立效应。

其次, 本研究构建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模型。认知能量理论(cognitive energetics theory)理论强调行为驱动力与行为限制力之间的动态权衡(Hockey, 1996; Kruglanski et al., 2012)。该理论中认知和能量决定了“行为驱动力”的大小(Dunning, 1999), 促进行为认知和能量均可提高个体“行为驱动力”, 进而提高行为可能性。亲社会行为是存在行为限制力的行为: 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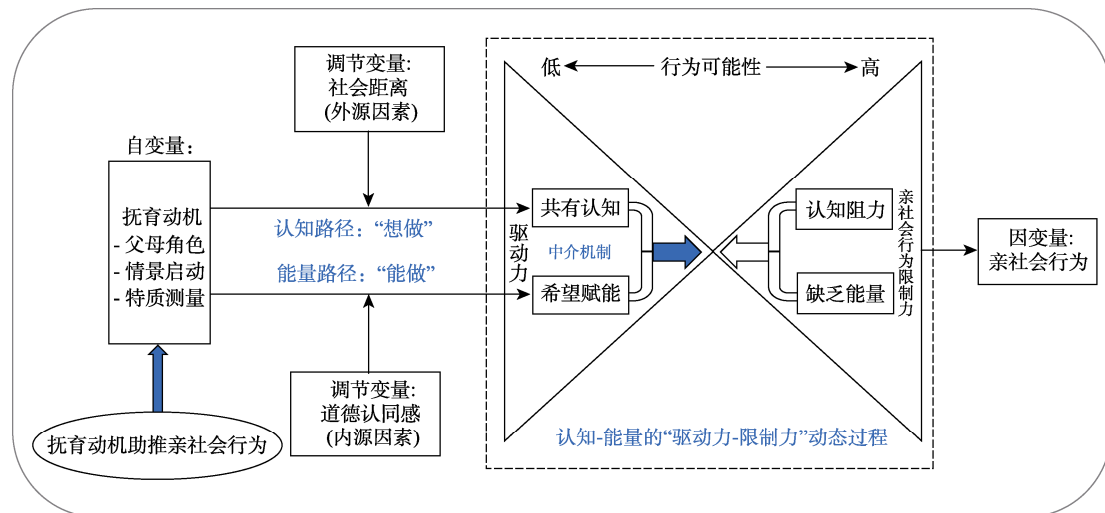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面,它通常涉及资源的自我付出(如时间或金钱),以惠及他人(Small & Cryder, 2016);另一方面,其结果往往不确定、反馈模糊,较难激发明确的行为动机(White et al., 2020)。因此,认知-能量理论为理解亲社会行为的驱动机制提供了适切的理论框架。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抚育动机会由于进化适应性驱动力,克服亲社会行为限制力并促进亲社会行为。具体而言,该驱动力中的“认知路径”为抚育动机导致的共有关系认知,而该驱动力中的“能量路径”则为抚育动机导致的希望情绪赋能:

认知路径。亲社会行为的实施首先依赖于认知动因(想做)。根据认知-能量理论,想要从事某行为的认知为个体行动提供方向性引导。本研究认为,抚育动机改变了个体对亲社会行为受益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认知。具体而言,抚育动机会促使个体更倾向于采用共有关系的认知,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共有关系是具有适应性的关系认知:在人类早期社会,人类依靠共有关系获得生存必须的资源(Kelley et al., 2003);在当代社会,共有关系认知也是建立社会联系的重要方式,当个体期望建立联盟时,会更有可能持有共有关系认知而不是交换关系认知(Cannon & Rucker, 2020)。因此,当抚育动机被激活时,个体可能更容易将与他人的关系知觉为“共有关系”而非“交换关系”,从而缓解亲社会行为中对“自我-他人”获益分配的心理权衡。已有研究也表明,共有关系认知显著增强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向(Guo et al., 2022)。此外,本研究进一步提出,社会距离调节这一认知路径的效应:若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路径是由于抚育动机导致了更强的共有关系认知,以期获取社会联系和资源,那么该效应在无法建立共有关系的群体中可能会减弱,如社会距离较远的群体。

能量路径。亲社会行为的产生需要以个体充足的行为能量为前提(能做)。既有研究表明,行为能量不足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例如行为的不确定性会削弱人们采取亲社会行为的意愿,特别是在难以判断该行为是否真正有助于他人时(White et al., 2020)。进化心理学研究指出,适应性情绪通过重新分配行为能量,使个体在应对关键生存或繁衍挑战时,暂时抑制次要需求,集中资源以解决核心问题(Griskevicius et al.,

2009)。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基因延续的可能性会激发“希望”这一进化适应性情绪(Bunston et al., 1995),进而为后续行为提供能量。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保有希望可以使得人们在面对困境时免于陷入绝望,调动能动性去适应环境(Lazarus, 1999)。希望情绪也在以往研究中被发现在遭受挫折时促使人们重新振作并采取行动(Snyder, 2002)。此外,我们假设这一能量路径会被个体的道德认同所调节:当个体的道德认同较低(vs. 高)时,可能不认为亲社会行为是适应性行为,适应性情绪不会被激发进而为亲社会行为提供能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效应会被削弱。

通过对上述模型的探讨,本研究对相关研究领域做出如下贡献:第一,为亲社会行为研究做出贡献。首先,本研究探讨了亲社会行为的全新前因变量——抚育动机。虽然以往研究从个体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情景因素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但尚未有研究探讨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其次,不同于以往研究大多从“自利动机”以及“利他动机”角度探讨亲社会行为的驱动力,本研究从进化适应性视角探讨抚育动机通过“认知-能量”路径驱动亲社会行为,为亲社会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动机视角。本研究也为进化心理学视角下的亲社会行为做出贡献。虽然以往研究探讨了进化驱动力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如择偶动机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Borau et al., 2021),但尚未有研究从进化适应性下的抚育动机角度探讨亲社会行为;以往的亲社会进化解释机制也存在争议,本研究从进化适应性机遇获取视角解释亲社会行为,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启示。第二,揭示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路径。认知-能量理论通常用于解释有行为限制力、需要个体付出或坚持的行为(Kruglanski et al., 2012)。本研究将“认知-能量”理论运用到解释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中,拓展了该理论的运用范围。同时,本研究揭示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具体“认知-能量”路径。其中,“共有认知”路径:抚育动机促使个体更多将与受助者的关系认知为共有型(vs. 交换型)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为共有关系理论做出贡献;“希望赋能”路径:抚育动机进化适应性改变了个体行为能量的分配。当面对适应性机遇时(如:亲

社会行为), 抚育动机会导致更多希望情绪进而为后续行为赋能, 揭示了抚育动机通过唤醒希望情绪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能量—助人”(motivated to help)路径。第三, 本研究也为抚育动机相关研究做出贡献。首先, 不同于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于抚育动机导致的一系列回避导向行为改变, 如更加重视规避风险、谨慎而小心等(Schaller, 2018), 本研究探讨了抚育动机导致的有利于后代存活的机遇获取行为(亲社会行为)。其次, 本研究发现进化适应性下的抚育动机会通过“认知-能量”机制促进亲社会行为, 拓展了抚育动机行为解释机制。

最后, 通过将本研究的研究发现运用在实地助推实验中,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预期为企业和个体提高亲社会行为提供实践启示。一方面, 企业或非营利组织可通过大数据测定目标群体抚育动机的差异, 精准推送助捐宣传; 另一方面, 可通过情景设置启动抚育动机, 进而达到更好的亲社会行为说服效果, 助推个人和组织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参考文献

- 耿晓伟, 张峰, 王艳净, 范琳琳, 姚艳. (2018). 健康目标启动降低高热量食物消费. *心理学报*, 50(8), 840-847.
- 何贵兵, 李纾, 梁竹苑. (2018). 以小拨大: 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 *心理学报*, 50(8), 803-813.
- 李纾. (2016). *决策心理: 齐当别之道*.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刘楠, 安薪如, 李爱梅, 刘培, 孙海龙. (2022). 现在避害, 未来趋利: 目标框架和时间距离交互影响疫苗说服有效性. *心理学报*, 54(12), 1532-1547.
- 孙倩, 李晴蕾, 刘永芳. (2023). 异性互动情境中程序公平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科学*, 46(2), 411-418.
- 孙庆洲, 黄靖茹, 虞晓芬, 高倾德. (2023).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高、低社会阶层的捐助行为差异. *心理学报*, 55(10), 1677-1695.
- 王晓田. (2007). 投资决策进化心理学的研究: 预期的私人资金分配和父母对子女的差异性精力投入. *心理学报*, 39(3), 406-414.
- 谢晓非, 王逸璐, 顾思义, 李蔚. (2017). 利他仅仅利他吗?——进化视角的双路径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 25(9), 1441-1455.
- 杨方方. (2022). 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 *社会保障评论*, 6(1), 133-159.
- 姚琦, 吴章建, 张常清, 符国群. (2020). 权力感对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报*, 52(12), 1421-1435.
- 张伟伟, 陈逸群, 朱莉琪. (2023). “近朱者赤”: 同伴捐赠决策信息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 *心理学报*, 55(9), 1453-1464.
- 郑晓莹, 彭泗清, 彭璐璐. (2015). “达”则兼济天下? 社会比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心理机制. *心理学报*, 47(2), 243-250.
- Aquino, K., & Reed II, A. (2002).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6), 1423-1440.
- Basu, S. (2021). Framing an altruistic action in periodic (versus aggregate) terms reduces people's moral evaluation of the act and the act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7, 104205.
- Batson, C. D. (2011). *Altruism in hum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tson, C. D., & Moran, T. (1999). Empathy - induced altruism in a prisoner's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7), 909-924.
- Berman, J. Z., & Silver, I. (2022). Prosocial behavior and reputation: When does doing good lead to looking good?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3, 102-107.
- Beshears, J., Dai, H., Milkman, K. L., & Benartzi, S. (2021). Using fresh starts to nudge increased retirement saving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67, 72-87.
- Bigman, Y. E., & Tamir, M. (2016). The road to heaven is paved with effort: Perceived effort amplifies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5(12), 1654-1669.
- Böhm, R., Theelen, M. M., Rusch, H., & Van Lange, P. A. (2018). Costs, needs, and integration efforts shape helping behavior toward refuge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28), 7284-7289.
- Borau, S., Elgaaiied - Gambier, L., & Barbarossa, C. (2021). The green mate appeal: Men's pro - environmental consumption is an honest signal of commitment to their partner. *Psychology & Marketing*, 38(2), 266-285.
- Bornstein, M. H. (2002). *Handbook of parenting: Social conditions and applied parenting* (2nd ed., Vols. 1-4). Mahwah, NJ: Erlbaum.
- Brough, A. R., Wilkie, J. E. B., Ma, J., Isaac, M. S., & Gal, D. (2016). Is eco-friendly unmanly? The green-feminine stereotype and its effect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3(4), 567-582.
- Bryan, A. D., Hammer, J. C., & Fisher, J. D. (2000). Whose hands reach out to the homeless? Patterns of helping among high and low communally oriented individual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0(5), 887-905.
- Buckels, E. E., Beall, A. T., Hofer, M. K., Lin, E. Y., Zhou, Z., & Schaller, M. (2015).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ctivation of the parental care motivational system: Assessment, prediction,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3), 497-514.
- Bunston, T., Mings, D., Mackie, A., & Jones, D. (1995). Facilitating hopefulness: The determinants of hope.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Oncology*, 13(4), 79-103.
- Bury, S. M., Wenzel, M., & Woodyatt, L. (2020). Against the odds: Hope as an antecedent of support for climate change

-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9(2), 289–310.
- Cakanlar, A., Nikolova, H., & Nenkov, G. Y. (2023). I will be green for us: When consumers compensate for their partners' unsustainable behavi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60(1), 110–129.
- Cannon, C., & Rucker, D. D. (2020). The communal consumer: Longitudinal evidence f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urturing and affiliative motives.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5(3), 345–355.
- Canova, L., Rattazzi, A. M. M., & Webley, P. (2005).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aving mo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6(1), 21–34.
- Carver, C. S., & Harmon-Jones, E. (2009). Anger is an approach-related affect: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2), 183–204.
- Cavanaugh, L. A., Bettman, J. R., & Luce, M. F. (2015). Feeling love and doing more for distant others: Specific positive emotions differentially affect prosocial consump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52(5), 657–673.
- Chisholm, J. S., Ellison, P. T., Evans, J., Lee, P., Lieberman, L. S., Pavlik, Z., ... Worthman, C. M. (1993). Death, hope, and sex: Life-history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and comments and reply]. *Current Anthropology*, 34(1), 1–24.
- Christ, C. C., Carlo, G., & Stoltenberg, S. F. (2016). Oxytocin receptor (OXTR)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directly predict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perspective taking and empathic concer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4(2), 204–213.
- Clark, M. S., & Mills, J. R. (2012). A theory of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 In P. A. M. Van Lange, A. W.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pp. 232–250). Sage Publications Ltd.
- Clark, M. S., & Mills, J. (199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 What it is and is no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6), 684–691.
- Clark, M. S., & Mills, J. (1979).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exchange and commu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1), 12–24.
- Cohen-Chen, S., Crisp, R. J., & Halperin, E. (2015). Perceptions of a changing world induce hope and promote peace in intractable conflic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4), 498–512.
- Cosmides, L., & Tooby, J. (2000).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emotions. In M. Lewis & J. M. Haviland-Jones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2nd ed., Vol. 2, pp. 91–115). Guilford Press.
- Cronqvist, H., & Yu, F. (2017). Shaped by their daughters: Executives, female socializ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6(3), 543–562.
- Darwin, C.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London, England: John Murray.
- De Dreu, C. K. W., Fariña, A., Gross, J., & Romano, A. (2022). Prosociality as a foundation for intergroup conflict.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4, 112–116.
- DeWall, C. N., Baumeister, R. F., Schurtz, D. R., & Gailliot, M. T. (2010). Acting on limited resources: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self-regulatory depletion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 Hoyle (Ed.),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self-regulation* (pp. 243–262). Oxford, England: Wiley-Blackwell.
- Duclos, R., & Barasch, A. (2014). Prosocial behavior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How donor self-construal and recipient group-membership shape generosity.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1(1), 93–108.
- Dunning, D. (1999). A newer look: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concepts. *Psychological Inquiry*, 10(1), 1–11.
- Eberle, D., Berens, G., & Li, T. (2013). The impact of interacti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unication on corporate reput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8, 731–746.
- Eibach, R. P., Libby, L. K., & Ehrlinger, J. (2009). Priming family values: How being a parent affects moral evaluations of harmless but offensive a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5), 1160–1163.
- Eibach, R. P., & Mock, S. E. (2011). The vigilant parent: Parental role salience affects parents' risk perceptions, risk-aversion, and trust in strang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3), 694–697.
- Eisenberg, N., & Mussen, P. H. (1989). *The roots of pro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lk, A., & Graeber, T. (2020). Delayed negative effects of prosocial spending on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12), 6463–6468.
- Feldman, R., &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2017). Oxytocin: A parenting hormone.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5, 13–18.
- Fessler, D. M., Holbrook, C., Pollack, J. S., & Hahn-Holbrook, J. (2014). Stranger danger: Parenthood increases the envisioned bodily formidability of menacing me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5(2), 109–117.
- Geary, D. C. (2000). Evolution and proximate expression of human paternal inve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1), 55–77.
- Gilead, M., & Liberman, N. (2014). We take care of our own: Caregiving salience increases out-group bias in response to out-group threa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7), 1380–1387.
- Goenka, S., & Van Osselaer, S. M. (2019). Charities can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donation appeals by using a morally congruent positive emo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6(4), 774–790.
- Grant, A. M. (2008). Does intrinsic motivation fuel the

- prosocial fire? Motivational synergy in predicting persistence,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1), 48–58.
- Griskevicius, V., Goldstein, N. J., Mortensen, C. R., Sundie, J. M., Cialdini, R. B., & Kenrick, D. T. (2009). Fear and loving in Las Vegas: Evolution, emotion, and persuas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6(3), 384–395.
- Griskevicius, V., & Kenrick, D. T. (2013). Fundamental motives: How evolutionary needs influence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3(3), 372–386.
- Gross, J., & De Dreu, C. K. (2019). The rise and fall of cooperation through reputa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1), 776.
- Guo, Y., Chen, X., Ma, J., Li, Y., & Hommey, C. (2022). How belief in a just world leads to prosocial behaviours: The role of communal orient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5, 111642.
- Hamilton, R., Ferraro, R., Haws, K. L., & Mukhopadhyay, A. (2021). Traveling with companions: The social customer journey. *Journal of Marketing*, 85(1), 68–92.
- Hardy, C. L., & van Vugt, M. (2006). Nice guys finish first: The competitive altruism hypothe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10), 1402–1413.
- He, G., Pan, Y., Park, A., Sawada, Y., & Tan, E. S. (2023). Reducing single-use cutlery with green nudges: Evidence from China's food-delivery industry. *Science*, 381(6662), eadd9884.
- Hockey, G. R. J. (1996). Energetical control processes in the regulation of human performance. In W. Battmann & S. Dutke (Eds.), *Processes of the molar regulation of behavior* (pp. 271–287). Pabst Science Publishers.
- Imas, A. (2014). Working for the “warm glow”: On the benefits and limits of prosocial incentiv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14, 14–18.
- Johnson, J. W., & Grimm, P. E. (2010).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 perceptions as separate constructs and their role in motivations to donate.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3), 282–294.
- Kelley, H. H., Holmes, J. G., Kerr, N. L., Reis, H. T., Rusbult, C. E., & Van Lange, P. A. (2003). *An atlas of interpersonal situ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ltner, D., Haidt, J., & Shiota, M. N. (2006). Social funct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emotions. In M. Schaller, A. N. Hastert, & A. J. Crandall (Eds.), *Evolu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 (pp. 115–142). Psychology Press.
- Kenrick, D. T., Neuberg, S. L., Griskevicius, V., Becker, D. V., & Schaller, M. (2010). Goal-driven cognition and functional behavior: The fundamental-motives framework.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 63–67.
- Kerry, N., & Murray, D. R. (2018). Conservative parenting: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hood, moral judgment, and social conservat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4, 88–96.
- Kerry, N., & Murray, D. R. (2020). Politics and parental care: Experimental and mediational tests of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parenting motivation and social conservatism.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1(2), 284–292.
- Korner, I. N. (1970). Hope as a method of coping.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4(2), 134–139.
- Kruglanski, A. W., Bélanger, J. J., Chen, X., Köpetz, C., Pierro, A., & Mannetti, L. (2012). The energetics of motivated cognition: A force-field analysis.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1), 1–20.
- Kurzban, R., Burton-Chellew, M. N., & West, S. A. (2015). The evolution of altruism in huma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6, 575–599.
- Labroo, A. A., & Goldsmith, K. (2021). The dirty underbelly of prosocial behavior: Reconceptualizing greater good as an ecosystem with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31(3), 417–428.
- Lanaj, K., Foulk, T. A., & Erez, A. (2019). Energizing leaders via self-reflection: A within-person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4(1), 1–18.
- Lazarus, R. S. (1999). Hope: An emotion and a vital coping resource against despair. *Social Research*, 66(3), 653–678.
- Lazarus, R. S. (2006). Emotion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oward a person-centered conceptualization of emotions and co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4(1), 9–46.
- Lee, J., & Shrum, L. (2012).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versus charitable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social exclusion: A differential needs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9(3), 530–544.
- Lee, S., Hanna, S., & Siregar, M. (1997). Children's college as a saving goal. *Journal of Financial Counseling and Planning*, 8(1), 33.
- Lewis, D. M., Al-Shawaf, L., Conroy-Beam, D., Asao, K., & Buss, D. M. (2017).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 how-to guide. *American Psychologist*, 72(4), 353–373.
- Li, Y. J., & Gong, H. (2018). Being a parent together: Parental role salience promotes an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1462.
- Li, Y. J., Haws, K. L., & Griskevicius, V. (2019). Parenting motivation and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5(5), 1117–1137.
- Li, Y. J., & Liu, Y. (2018). Are parents patient?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role salience and parental status on impati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1523.
- Liang, J., Chen, Z., & Lei, J. (2016). Inspire me to donate: The use of strength emotion in donation appeal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6(2), 283–288.
- Liang, Y. T., Huang, Z. Q., & Su, L. (2023). Too time-crunched to seek variety: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motivation on consumer variety seek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60(4), 812–833.
- Liao, H., Su, R., Ptashnik, T., & Nielsen, J. (2022). Feeling

- good, doing good, and getting ahead: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utcomes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at 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8(3-4), 158-198.
- Lorenz, K. (1943). Die angeborenen Formen möglicher Erfahrung. *Zeitschrift für Tierpsychologie*, 5(2), 235-409.
- McDougall, W. (1908).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 Mesurado, B., & Richaud, M. C.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variables, empathy and prosocial-flow with prosocial behavior toward strangers, friends, and famil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8, 843-860.
- Nelissen, R. M. (2017). The motivational properties of hope in goal striving. *Cognition and Emotion*, 31(2), 225-237.
- Neuberg, S. L., Kenrick, D. T., & Schaller, M. (2010).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In S. T. Fiske, D. T.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 pp. 761-796). John Wiley & Sons, Inc.
- Nowak, M. A. (2006). 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Science*, 314(5805), 1560-1563.
- O'Brien, E., & Kassirer, S. (2019). People are slow to adapt to the warm glow of giv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30(2), 193-204.
- Pataki, S. P., Shapiro, C., & Clark, M. S. (1994).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appropriate norms for friendships and acquaintanc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1(3), 427-442.
- Penner, L. A., Dovidio, J. F., Piliavin, J. A., & Schroeder, D. A. (2005). Prosocial behavior: Multileve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6, 365-392.
- Preston, S. D. (2013). The origins of altruism in offspring ca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6), 1305-1341.
- Reed, A., Aquino, K., & Levy, E. (2007). Moral identity and judgments of charitable behaviors. *Journal of Marketing*, 71(1), 178-193.
- Reed II, A., Kay, A., Finnel, S., Aquino, K., & Levy, E. (2016). I don't want the money, I just want your time: How moral identity overcomes the aversion to giving time to prosocial cau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0(3), 435-457.
- Roux, C., Goldsmith, K., & Bonezzi, A. (2015). On the psychology of scarcity: When reminders of resource scarcity promote selfish (and generous)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2(4), 615-631.
- Schaller, M. (2018). The parental care motivational system and why it matters (for everyon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5), 295-301.
- Schaller, M., Kenrick, D. T., Neel, R., & Neuberg, S. L. (2017). Evolution and human motivation: A fundamental motives framework.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1(6), e12319.
- Sherman, G. D., Haidt, J., & Coan, J. A. (2009). Viewing cute images increases behavioral carefulness. *Emotion*, 9(2), 282-286.
- Shih, M., Wang, E., Trahan Bucher, A., & Stotzer, R. (2009). Perspective taking: Reducing prejudice towards general outgroups and specific individual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2(5), 565-577.
- Small, D. A., & Cryder, C. (2016). Prosocial consumer behavior.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0, 107-111.
- Snyder, C. R. (2002). Hope theory: Rainbows in the mind. *Psychological Inquiry*, 13(4), 249-275.
- Stavrova, O., & Siegers, P. (2014). Religious prosociality and morality across cultures: How social enforcement of religion shapes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religiosity on prosocial and mor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0(3), 315-333.
- Stenstrom, E. P., Saad, G., & Hingston, S. T. (2018). Menstrual cycle effects on prosocial orientation, gift giving, and charitable giving.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84, 82-88.
- Supphellen, M., & Nelson, M. R. (2001). Developing, exploring, and validating a typology of private philanthropic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2(5), 573-603.
- Thaler, R. H., & Sunstein, C. R. (2021). *Nudge: The final edition*. Penguin Books.
- Thompson, L., & DeHarpport, T. (1998). Relationships, goal incompatibility, and communal orientation in negotiation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 33-44.
- Tooby, J., & Cosmides, L. (2015).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 D. M. Buss (Ed.),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nd ed., Vol. 1, pp. 5-67). John Wiley & Sons, Inc.
- Trivers, R. L. (1971).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1), 35-57.
- Wang, Y., Ge, J., Zhang, H., Wang, H., & Xie, X. (2020). Altruistic behaviors relieve physical pa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2), 950-958.
- White, K., Habib, R., & Dahl, D. W. (2020). A review and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the drivers of prosocial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5(1), 2-18.
- Wu, J., Luan, S., & Raihani, N. (2022). Reward, punish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4, 117-123.
- Yan, L., & Murray, K. B. (2023). The motivational dynamics of arousal and values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behavior: A cognitive energetics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40(3), 679-699.
- Zahavi, A. (1975). Mate selection-a selection for a handicap.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53(1), 205-214.

How parenting motivation influence pro-social behavior? A cognitive-energetics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LIU Nan¹, QIU Yuting¹, DONG Zhiqiang¹, LI Aimei²

(¹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²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Prosocial behaviors—such as helping, donating, and volunteering—are essential to societal well-being, yet individuals often hesitate to engage in them. Parenting motivation, a concept rooted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has recently gained attention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s a potential driver of human behavior. While it has been linked to various adaptive actions,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role in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parenting motivation influences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a “cognitive-energetics” dual pathway. Study 1 examines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parenting motivation on prosocial actions using multiple methods. Study 2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identifies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se effects are strengthened or diminished. Study 3 applies these insights to a real-world context, testing interventions that encourage prosocial behavior. Together, the findings offer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ary roots of prosociality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fostering prosocial actions.

Keywords: parenting motivation, prosocial behavior,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cognitive-energetic” mechanism